改革开放与全球经济

洪俊杰 李坤望等

编者按:本文内容是根据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华经济研究院(中国台湾)、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等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在经济所建所 90 周年国际研讨会 2019 年 5 月 17 日第四单元主题论坛"改革开放与全球经济"上的发言编辑整理而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教授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李坤望教授分别主持了两个时段的讨论。

巴里・诺顿(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现在人们都很关心中美贸易摩擦, 所以首先阐述美国社会各界的看法。

第一,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还是非常好的,虽然美国政府不一定有同样的看法。这一点应该被重视,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到 2020 年会有新的政府。我们应该思考长期来看,什么是最好的政策,什么是最好的反应。

第二,美国政府主要通过三个实体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总统,但是其不是唯一的影响实体。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总统的立场和看法,但是可以猜测其有哪些目标。另一个实体是,USTR贸易代表处,其觉得中国的产业政策以及很多机构体制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第三个实体是国家安全机构,这些机构中的很多人非常害怕中国。中国需要了解这三个实体怎么平衡,通过逐步了解这些情况,进而逐步改善中美经贸关系。

最后,人们经常认为,在两国贸易摩擦背后,往往是两个国家在竞争技术的高点,或者在争夺权利,或者是有其他什么竞争。然而,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这个分析框架也许能解释这些问题的 20%,但不能解释大多数。我更希望知道这两个大国应该制定哪些规则来竞争,虽然它们进入了竞争的时期,但是这种竞争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竞争,而应该是有规则的竞争。虽然现在两个国家都没有按照之前的规则进行竞争,但是将来应该制定最好的竞争规则。中国是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所以中国完全能够接受公平竞争的规则。因此,经济学家能不能找到一套公平竞争的规则可能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陈思宽(中华经济研究院(中国台湾)):我侧重谈谈台湾地区的汇率政策。汇率政策其实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利用货币、汇率的升降控制进出口和资本的流动,希望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因为它是一种总体经济政策,所以具有一定的政策目标和一定的操作规则,每个国家或地区也不尽相同。其目标大概包含维持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维持币值稳定、控制通货膨胀、保证金融体系稳定,或者是这些目标的组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会员单位实际状况,将汇率制度分成四大类,包括硬性钉住、软性钉住和浮动等汇率制度。我将其分成两类,分别是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各有优点和缺点。争论的重点在于汇率政策到底应该坚持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新古典学派认为应该尊重市场机制,但是凯恩斯学派认为市场缺乏效率,政府应该介入。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之前,大部分亚洲经济体的汇率政策是钉住美元。1995以前,当时区

域内经济体表现其实很优异,吸引了大量的 FDI 和证券投资流入亚洲。而且,当时东亚经济体出口增长大都达到了两位数字,大约为 15%~25%,固定汇率对经济增长、贸易、投资都有很大贡献。但是 1995 年以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弱点开始显现,因为实施了资本自由化。固定汇率虽然可以鼓励贸易、鼓励投资,但是当资本流入导致经济过热的时候,就没有货币工具可以疏解,即经常提到的不可能三角问题。金融风暴之后,大部分亚洲经济体改为采取弹性汇率制度,当然不是真正的自由浮动,而且大都意识到充裕的外汇可能比汇率制度更加重要。

至于台湾地区的汇率政策,货币当局的目标是:一是促进金融稳定;二是健全银行业务;三是维护对内及对外币值的稳定;四是积累外汇、稳定汇率。我们将台湾地区的汇率政策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二战之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这个时候台湾地区采取高度干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增加生产、稳定经济、进行币制改革、抑制通货膨胀、实施土地改革、增加农业生产。同时,也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严格的外汇和贸易管制政策以及关税保护措施。此外,为了出口扩张并追求经济增长,实施单一固定汇率制度,也设立了出口加工区。另外,实施了外汇配额及复式汇率制度,后来又改为单一固定汇率制度。所以,那个时期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基本上维持在 140%,没有太大改变。

第二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台湾地区推动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所以之前的一些政策干预措施有所放松,包括 1978 年把固定汇率制度改为浮动汇率制度,包括管理浮动(肮脏浮动)。1987 年出台管理外汇条例,放松外汇管制,1989 年取消固定汇率制度,完全由市场决定。此外,也开放了证券公司的设立、迈向资本自由化等措施,以及调降关税、松绑贸易管制等举措。所以,在这个阶段,台湾地区的出口跟进口都大幅度上升,顺差也大幅增加,外汇存量快速上升。

第三个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台湾地区的经济已经自由化,包含金融自由化,其中,岛外银行可设立分行和办事处,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不断设立;电信市场也自由化,民营电信公司陆续设立。在这个阶段,台湾地区顺差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持续上升,经济增长率稳定上升。

唐宜红(中央财经大学):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现在是一个热门而重要的话题。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有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等。技术创新非常重要,当今新技术创新,比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经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和消费方式。在全球经济时代,这些创新对出口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研究了智能制造对于出口的影响。

关于智能制造,我们主要采用 2003—2012 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关于安装工业机器人的相关数据来衡量智能制造水平,研究智能制造与出口的关系。当前,关于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方面的战略,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主要的发达国家制定了全面的前瞻性智能制造战略,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和"工业互联网战略",德国的"工业 4.0 计划",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战略",日本的"机器人新战略",英国的"制造业 2025",等等。

从实际的智能制造来看,发达国家已经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现在主要是美国、日本和德国成为智能制造发展的引领国家。据统计,从每万人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看,2012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密度为每万人 58 台,其中韩国每万人 396 台,日本每万人 332 台,德国每万人 273 台。中国现在的数据是每万人 11 台,中国制定的《机器人产业发展战略(2016—2020)》提出,到 2020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人 150 台以上。可以看到,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制造业的竞争中会有怎样的表现。智能制造,尤其以机器人为例,主要是通过两方面的途径来影响制造水平及其出口。一方面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是对于质量的影响。之前更多的人关注降低成本的影响,但是对质量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因为新技术对产品研

发、设计、生产全过程都可能产生影响,且使得产品的设计质量更高,整个设计与生产的模式会更先进。

从国别来看,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更能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的出口。从产品的类型来说,无论是对资本品、中间品还是消费品,智能制造对于出口都有显著的作用。出口国的机器人会显著促进其出口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

因此,要利用好智能制造提高竞争力的机会,但是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根据现有的发展程度,有它们自己应有的选择。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可通过智能制造使原来缺乏劳动力的情况得到缓解。这可以克服他们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困惑,他们未来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也可能有自己的新优势。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现在可以通过智能制造改进和回流。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优势是劳动红利,机器替代了劳动力之后,就业问题将面临很大的挑战。 另外,面对国际竞争,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优势在劳动力方面,但是现在发达国家通过智能制造也获得 一些劳动力方面的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面临新的竞争格局。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在传统的优势上 进行创新,怎样在新行业参与国际竞争,怎样利用新技术创新来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这些问题的研究 非常重要。

陆毅(清华大学):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包括改革和开放这两个相互互补的措施,但是改革和开放是分别由不同的人在做,这跟国内的学科分布有关。开放属于国际贸易学科,而改革可能属于发展经济学。但是其实这两个方面经常互动,例如我们一直在说开放促改革。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即除了引进资本和技术外,很重要的是引入竞争。当然,改革其实也是希望通过竞争,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提高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一种方式是内生机制,我们自己不断地引入市场机制、引入竞争。通过市场、通过价格进行资源配置。这个做法很好,但是会遇到深层次的阻力问题,开放则相当于引入一个外部的竞争者,通过外部的竞争来促使内部的改革,促进内部资源优化。所以开放也可以促改革。

另一方面,改革有利于更好开放,包括现在提出的结构转型、供给侧改革,可以提高自身竞争力,在全球竞争体系、全球价值链中有更好的定位,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此外,谈到贸易摩擦,以前说分工有利于合作,但是现在大家也意识到,其实分工使得自身在整个产业环节当中属于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因而较以前更受制于人。怎样通过自己内部改革、内部提升更好地在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将非常重要。所以,改革和开放其实是两个相互互动的环节。

另外一个关键词是全球经济。中国早期谈改革和开放,主要希望通过自己实力的提高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 40 年的发展,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以后在全球经济中一定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还不能说是引领作用。我们怎么在全球经济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怎么参与全球治理,怎么通过自己的改革开放参与到全球治理结构改善中,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话题。

最近我国对 WTO 改革提出了一个方案,但是 WTO 仅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我们还应该更多地参与其他方面,怎么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共同发展中起更多作用,这也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邱斌(东南大学):中国经济结构性变革与中美贸易摩擦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例如,中国经济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而不是粗放的数量型发展。同时,中国经济也正在改变过多依赖对外贸易驱动的状况,更多转向由内需拉动。另外,经国外专家测算,中国对外贸易净出口只占中国整个 GDP 的 1.3%,而韩国和德国的这个比例则分别为 8%和

5%。在此背景下,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发动的贸易摩擦会从客观上推动中国经济进行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变革。

保证要素流动是中国结构性变化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公路、铁路的联结,中国各地的生产要素可以更自由地流动,从而使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可以进入要素市场,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近些年,由于高铁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要素流动更加便利,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逐渐形成,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并在规模效应和市场分工的促进下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比较优势的存在,中美之间也形成了非常好的分工协作关系,促进了国际要素流动。来自美国的产业转移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出口到美国,极大地降低了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成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豪斯曼(J. Hausman)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沃尔玛这一商业巨无霸及其超强议价能力的存在,美国食品的价格下降了15%~25%,而沃尔玛相当多的采购来自中国。

但是,特朗普征税导致全球供应链体系受到破坏,原本符合劳动分工原则的国际生产体系趋于瓦解,损害了中美双方的利益。受此负面预期影响后,中国企业一定会寻求新的分工合作伙伴和出口目的地,尽管这种调整还需要较长时间。另一方面,贸易战中美国消费者需要面对比自由贸易情况下更高的商品价格,美国著名国际经济学家阿米蒂等人(M. Amiti et al)研究发现,在2018年期间,美国经历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总体来说关税上升带来的影响全部由美国国内消费者承担,到2018年底,美国的实际收入每月大约减少14亿美元。同时,特朗普的"麻烦制造者"姿态有损美国国际形象,使其长久以来所构造的国家形象之递延资产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这对美国而言是更加严重的问题。总之,加税的损害一定是相互的,从长远来看,对美国的损害更大,因此任何一方都必须理性互让。

即便贸易摩擦带来的是双输的结局,我们也不能对特朗普的主动收手"心存幻想"。一方面,特朗普在贸易摩擦中的举动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养成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奥尔森在他著名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里已经强调了对等措施的必要性,中国也需要具备相应的抵御手段。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最好的抵御手段就是保证自身的发展。一方面,中国的超大规模所带来的绝对优势不一定能够形成特定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但可能形成地区间的比较优势,随着结构性变革的推进,国内要素充分流动形成的分工体系能够部分替代国际分工。另一方面,美国不能代表世界,虽然现有全球供求体系受损,但新的替代体系会逐渐形成。

我们相信,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非常大。如果我们以平常心对待贸易战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那么,中国一定会在长期取得最终的胜利。

刘佳(广东省政府参事室):今年广东开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我觉得中央有先见之明,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我们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建设大湾区是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措施,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对于香港、澳门地区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机遇,一是促进长期繁荣稳定,再者是提供新的发展动能。对于广东来说,它也是继续做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大机遇和大文章,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同时建立高水平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平台。建设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尽管大湾区含着金钥匙出生,天生丽质,万般宠爱于一身,给了最大的空间,给了最宽的开放之门,但是同样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挑战应该来自体制机制创新难题,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硬骨头。据此,我阐述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如何实现要素跨境畅通流动。大湾区包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货币,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差异很大。同时面对很多的障碍,行政成本非常高,造成企业的成本也很高,过去改革开放 40 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有些深层次的内部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服务贸易,实际上还

受到政策方面的阻碍,还没有真正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第二,如何打造趋同港澳的营商环境。城市无商不兴,要想扩大粤港澳的影响力,营商环境非常重要。香港和澳门地区是目前世界上较活跃的自由经济体,拥有高度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广东省这几年不断在改变,包括深圳前海、广东南沙、珠海横琴,三个自贸试验区都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按照世贸组织对营商环境的评价,分数在不断提高。虽然有改革,但是实际上还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现在到了深层次的改革,比如说有很多权限在中央部委,基层改革受到很多的限制。

第三,如何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航运能力。珠三角港口比较多,但是分属于粤港澳,虽然有一些竞争,但也存在着制约因素。如何应对这个挑战以做好大湾区的发展是今天的主题,也是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经济的一个非常好的试验平台。

总书记曾经指出,大湾区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国际上没有先例,要大胆闯、大胆试,开出一条新路。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首先坚持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着眼于国际投资贸易新规则,通过整体的谋划创新大胆把两制之特殊性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大胆破解粤港澳合作当中的问题。

第一,全面实现跨境要素的流动,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人流方面是很便利的,比如说未来在签注期要自由来往,合作查验一次性放行,在欧盟国家之间都是如此,非常便捷。目前海关监管工作还是太长,监管比较复杂。在金融方面,金融要严控,要注意安全,但是还是要提供便捷流通,在区域内实现一些创新试验,这样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而在税收方面,现在税种过于复杂,香港澳门是简单税制、低税率,澳门有12种税种,香港有15种税种。企业对此非常害怕,因为税种多,其实完全可以削减,简单税制对经济发展更有利。

第二,建立良好的环境。这次粤港澳大湾区提出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可以有更多的突破和创造性改革。但是现在需要授权,要有市场自由度、市场开放度、营商便利度方面的试验权和先行权,这样才能够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相一致。可以授权在这个区域内做一些试验,对成功的案例进行推广。现在新加坡和香港都有沙盒监管计划,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可以这样做。

第三,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深水码头建设。如果有一个新的合作深水港,可能会解决原来存在的一些分治竞争的问题,这可以探索,因为有非常好的深水条件,大湾区内有二三十米的水深,非常适合于建深水港。

过去 40 年的改变很大,改革也是一种扬弃,是内部主动的自我否定,只有这样,改革才能更好地适应客观情况,比如现在的中美贸易摩擦。

汪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从中美贸易争端可以看到,国际贸易问题与国内政策是紧密联系的。例如,中国的产业政策,恰好是这次中美贸易争端的一个焦点问题。可以从财政视角对此做简单的分析。

中国政府很重视经济发展,从财政角度看可以分两大方面:一是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支持产业发展。国内学界近些年对产业政策发起了很多讨论,但大都侧重于理念层面。实践中政府如何支持产业发展?尚缺少文献进行整体评估。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手段有很多,对地方政府而言主要是产业补贴。这恰是中美贸易争端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主要选择预算公开做得非常好的广东省及其下属的珠海市为案例,展示地方政府如何使用产业补贴支持产业发展。

在分析地方案例之前,需了解各级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财政资金有哪些来源。财政现在有四本预算,一般来说,支持产业发展的资金主要来自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两类。各级政府都会在一般公共预算中安排直接支持产业发展的资金,一般以包含专项转移支付在内的专项资金的形

式出现。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都可以属于经济建设领域,但其主体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属于间接支持产业发展范畴,直接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对较少。

首先看广东省级财政,其支持产业发展主要采取专项资金形式。本人逐笔检查了各个专项资金,判别其是否属于支持产业发展。结果发现,支持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涉及众多主管部门,往往是一个部门主管一个或多个支持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每个专项资金后面有多个使用方向。加总计算可以发现,2016年广东省级支持产业发展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资金,总共占省本级支出的12.3%。珠海市的情况类似,其将支持产业发展的资金分为实施创新驱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公共交通发展、促进产业转移等几大类。其2016年扶持产业投入约占市本级支出的10%。由此,以发达省份广东的情况来推断,支持产业发展的财政资金约占财政总支出的10%左右。当然,欠发达的中西部省市县不一定有这么多的资金量。

《中国会计年鉴》给出了全国 74 万户预算单位的经济类别的财政支出(包含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按其给出的数字,2017 年全国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支出约为 1.2 万亿元。如按这个数字,全国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不超过 5%。当然,经济类别中的"其他资本性支出"数额较大,其中一部分也可能属于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需要特别说明两点:

其一,以广东的情况来看,中国促进产业发展的补贴很少直接针对外贸,一般是针对企业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吸引人才,甚至包括用电奖励等。对于企业的绿色补贴、研发补贴,在发达国家也是较为多见,乃至一些投资补贴在美国等也很常见。因此,并不能认为中国的这些补贴就增加了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中国可能存在的问题是,补贴的细项过多过泛,外部看得太清楚,其实际效率也存在疑问。中国学界对此有很多批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财政领域也一直在清理归并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等。

其二,美国对中国的产业补贴攻击较多,但从宏观角度看,应当将产业补贴和企业税负联系起来综合分析。政府给企业的补贴占财政的比重,无论是5%还是10%,应当承认相对偏高。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名义税率也比较偏高,且税负绝大部分是由企业承担。中国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很少来自个人缴纳的直接税,大多来自企业承担的各项税费。因此,综合分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企业对财政的净贡献很大。也就是说,综合考虑税负和补贴,企业承担的财政责任实际比较大。

综合以上两点,结合当前的国际贸易形势,在全球化经济规则进入重塑的关键时期,中国可以考虑把产业补贴削减一些,同时把企业的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降低下来。这样,既不损害企业的利益, 又能回应国际上的一些批评声音。在一定意义上,这样还可以提高财政资金的总体绩效。

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我们应当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待中美贸易,究其原因是,全球分工越来越细化,引起了对于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以及模型构建的重新思考。需要对传统经济理论得出的结论重新解释,从中美贸易来看:

第一,贸易顺差以及出口贸易结构的比重统计数据都是基于全产品统计,但是如果考虑中间品贸易,所有数据都需要重新计算,要从增加值视角看统计数据。例如中美贸易顺差,公布的统计数据是 3700 亿美元,但是从增加值视角来看,只有 2000 多亿美元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出口方面,根据全产品计算,我国可能出口高技术产品比重很高。但是如果考虑高技术产品出口大部分是加工贸易,考虑到进口的核心零部件都从美国进口,那么这一比重可能就不高。

第二,从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对经济的影响来看,很多学者用不同的方法估计加征关税对于中国 GDP 的影响大概是在 $0.5\%\sim1.5\%$ 之间。所以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模型假设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全球分工和价值链没有断裂,但是如果全球价值链切断了,那么影响就会比较大了,会超过预期结果。

第三,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看,WTO的历史使命可能已经完成,难以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全球这么多国家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讨论问题,很多时候是不可行的,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为什么一些问题谈不下去,那是因为全球分工已经深入到产品内,甚至具体到生产阶段。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的问题是非常具体和细化的,很难谈拢。这也是区域贸易协定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很多贸易问题需要从双边角度来解决。但是,WTO规则仍然是适用的,有着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但是,对一些新产生的具体问题,需要通过双边贸易和区域贸易协定来解决,或者从自贸试验区的角度来对这些新问题进行规则的制定。

最后,贸易成本的问题。从中间品贸易或者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加征关税的成本有没有放大效应。过去几十年,全球的关税都在下降,分工越来越细化。如果没有关税等贸易成本的下降,也许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很难以深入发展下去的。同时,由于全球分工越来越细化,关税贸易成本的贸易效应被放大,一个环节加征关税可能使得整个生产链的贸易成本放大,这样对全球化和全球分工细化会带来更大的不利影响。

郎丽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当前的情况以及中美经贸冲突对北京的影响是什么?今年年初以来,我们通过对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商委、中关村管委会、亦庄开发区及一些高科技企业的调研和座谈,了解的整体情况是:虽然自去年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开始出现恶化,但是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对北京的总体影响还看不出来,这与北京以内需为主有一定关系。短期看,对物价、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由于这种外部不确定性会长期存在,影响肯定会逐渐显现出来。对涉美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有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关键核心技术产品进口受限,主要受美国的限制和我们的反制影响,导致这些企业进口成本上升,国际人才流动受限,甚至部分业务休克。目前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技术产品对美的依赖性还比较高,替代性较低,这些企业受影响比较大。同时,一些企业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上升。

第二,专利审核的周期延长、难度加大。在美国注册商标专利和使用标准的审核周期都延长了,与美国合作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这样导致企业的信心受到波动,预期受到影响,所以很多企业在观望,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结果是,今年高技术企业收入增长放缓、出口下降。整体上感觉政府部门也很累,目前北京市各级政府工作都特别努力,我们跟商务部门接触比较多,他们一直在努力做好服务企业的工作。但是受大环境的影响,这方面成效不是很大。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压力也特别大,有些企业外迁,产业链出现转移。

所以,北京在努力改善营商环境。在营商环境的改善方面,可以看到政府确实做了很多工作, 2018年北京营商环境排名第一。但是企业感觉不是特别明显。开座谈会的时候,有一些企业对政 府进行政策咨询,政府部门直接做了回答,起到了良好的沟通作用。但反映出来的是,政企沟通不是 特别畅通。虽然政府很努力做,但是企业的反馈还不是特别理想。

另外,调研发现,政府管制相对还是比较多,比如在资金使用、人才聘用方面的限制等。例如,北京对人才的界定与企业的诉求不太匹配,企业需要技术人员,但是北京在高级人才方面主要从学历的角度界定,与企业的需求不匹配,以至于高新技术企业在人才聘任方面也感到压力很大。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企业反映媒体宣传不利于他们的工作。媒体可能想从积极的角度宣传企业工作理念、收获、成就,结果给企业包括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授人口实,反过来给涉外经济工作带来很大压力和负担。对于上述情况我们给出的建议是:

第一,进一步厘清市场和政府关系,政府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另外,应该建立常态化风险监测分析预警机制,正确引导舆情。

第二,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强、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应努力搞活内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

用。进一步发挥民间、市场化手段在高端人才引进、人员流动、科技交流方面的作用。

第三,提高政府政策透明度,包括中美经贸谈判的透明性。企业现在很困惑,没有预期,透明度 缺乏导致政府部门很累,企业也很累,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所以只能观望。

第四,改善营商环境,留住人才和企业。北京这几年人口整体上净流出,包括人才流出。原来想 疏解到天津和河北,但是结果是人才都外流到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发展需要人气,如果失去了人气, 就发展不起来。

黄新飞(中山大学):从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来讲,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可复制的经验问题。自贸试验区的主要功能是为国家总结经验,输送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像有些在深圳前海非常好的一些法治建设,如国际仲裁,在很多的内陆地区,因为国际经济交往比较少,就不具有可复制性。制度创新应该是集成性的共性创新,在这个过程中,由易到难会产生一个创新边界,出现成本递增问题,越到后面创新就越难。

第二,不对等的问题。事和权应该对等。虽然在自贸试验区的很多总体规划中已经确定了对等原则,但是当地政府未必能做,它要层层往中央报,所以一定会造成风险越小我才报,风险越高我可能就不报。在这个过程中,授权不充分,没有制度创新的容错机制。

第三,区块小和碎片化问题。很多自贸试验区块越做越小,碎片化就越来越厉害。现在很多的自贸试验区都是一大两小三个片区,面积最大者约120平方公里,成都是90平方公里,西安是87平方公里,大部分非省会的自贸试验区是20平方公里。这样就会造成省会城市的片区和非省会城市片区之间的不对称的问题。这种不对称性会造成制度创新的基础和制度资源的不对称集中,势必难以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自动创新的输出。此外,片区内部碎片化比较严重,如南沙片区面积为60平方公里,大概切了4个小片区,河南自贸试验区面积20平方公里,切成了7个片区。过度碎片化不利于集成式创新的出现。

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还是要有四梁八柱,要打好总体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实现双向投资和企业经营自由化。以前是吸收外资,现在在大的经贸背景下,吸收外资的企业会面临很大的外部竞争,因而会转向吸收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双向并重的轨道,所以要促进双向直接投资。

第二,金融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金融监管属于国家统一监管,在现有的监管模式下,地方政府做一些金融创新非常难。

第三,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跟香港和澳门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大概从承诺到真正开放只有36%,而商业存在、境外支付这些都很好开放。在这个区域内,当然它是"一国两制"、三个制度、三种经济法律制度,在这个区域内都很难做到服务贸易自由化,更谈不上全国的情况。

刘文革(浙江工商大学):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主要从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谈全球两大对立的战略思维和其背后的理论脉络。什么是地缘政治经济学,简单讲就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特定区域独立民族国家间政治经济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关系。在西方有比较成熟的地缘政治学,后来又有一些学者根据全球格局的变化研究地缘经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一个地缘经济合作方面的很好举措。但是,当今世界面临更多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地缘冲突。中国崛起和美国的遏制态势本身就是地缘冲突的大事。我们要反思传统的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展现的更多是关于合作的理论,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理论;而冲突问题在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特别薄弱,以至于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理论储备不足。

简单梳理来看,我们并非没有国际战略思维和理论基础。但是总体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

张以及实践过程,在西方一直有自由贸易加地缘或者区域控制的思维。这个思维伴随着经济全球活动扩张的实践而产生。回顾在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时期,从英国历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英国一直主张自由贸易,这个理念推广到全球。但是自由贸易理念是建立在英国经济强大基础上的,本身包含着对其他国家的市场扩张和原材料攫取,包含着殖民主义扩张的基因。因此,在自由贸易理念的背后,有地缘控制的思维,它也是霸权思维的一种。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进入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殖民地的瓜分已经接近尾声,基本上瓜分完了。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强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矛盾。最后的矛盾是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本身是通过极端手段争夺对区域的控制,不过手段太恶劣。在这个背景下,西方提出了多种地缘政治学说,逐渐提出了一些陆权说、海权说、陆地海洋边缘说等。这些学说有一个重要理论是世界核心是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的重要节点,谁就能控制整个欧亚大陆,这个时候西方地缘政治学就是以控制为主。但是同时在对外贸易上仍然还是宣扬自由贸易。从这里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往往对欠发达国家推行自由贸易学说和理念,而本身靠国家力量去干预经济,这时候凯恩斯主义也诞生了。

随着自由竞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要求区域扩张、区域控制的战略思维更加强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的霸主。世界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分工结构,就是中心国家或者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结构,也称霸权国家和边缘国家结构。其中强国是技术和创新的核心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成为原料来源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建立起来,仍然主张自由贸易,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这期间我国改革开放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这时候世界分工又开始出现大的变化,由二元逐渐变成三元,在中心和外围当中有一个制造环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制造环节方面开始和二元结构分离,国际分工结构成为三元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当国际分工格局变化时又产生了新矛盾,例如中美贸易冲突。在制造业环节分离出来以后,美国特别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走到中心环节,挑战以往在二元结构当中形成的美国经济的霸权。所以二战以后的世界分工格局演变到现在,我们看到现今的状况。

但是我们的地缘思维实际上被美国所误解了,什么被误解了呢?因为我们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思维一直是合作理念。比如,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大思维框架下一直以合作互助为主。我们的地缘思维是自由贸易加国际区域合作,不是区域控制思维。在"一带一路"当中,我们提出包容性发展、共享性发展,目标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目标非常远大,所以还有很多子共同体在支撑。在经济贸易方面,要构建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都是主张地缘思维的合作理念。所以,我们主张要构建以合作为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称之为新地缘经济学。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全球化,思考国际区域间包括独立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对如何解决和面对冲突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谢申祥(山东财经大学):我主要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引进外资的作用,吸引外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特征,以及外资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简要的总结和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 1978 年到 1993 年,引进外资金额迅速增长,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吸引外资的增长速度实际上超过贸易增速。第二,分区域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省份,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对比较少。第三,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主要集中在港澳台地区,集中度非常高。

那么,外资是不是对区域发展产生了很显著的影响。事实上,在加入 WTO 之前,外商投资确实

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但是加入 WTO 之后可能并不是这种结果。我们用 2004—2016 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地级市层面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增长率产生了负的影响。从企业层面来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重的增加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产生了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进来之后,可能形成了一定的垄断。

所以,有必要对我们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第一,前期吸引外资主要是想通过中国广阔的市场来换外商的技术,但是在我们加入WTO之后,这个策略可能不是很奏效,或者效果很不明显。第二,我们前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很多优惠条件,比如说土地价格优惠、税收的减免,这些政策甚至超过了内资企业,即所谓的超国民待遇。现在需要进行调整,应按照WTO的原则恢复国民待遇。第三,进一步从国内的政策角度来讲,应该采取市场化的竞争政策来促进竞争。促进外资和内资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是促进发达国家资本间的竞争,如美国、日本、欧盟之间FDI的竞争。通过竞争,促使他们拿出更好的技术,产生更好的技术溢出效应。

魏浩(北京师范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将从 2018 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新闻媒体和期刊才开始真正关注进口贸易问题。但是事实上,中国政府自从 2012 年开始就发布了一系列扩大进口的政策和指导意见。直到 2018 年举办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时候,进口贸易才真正得到了国内各界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18 年是中国进口的"元年"。在当前的国内外背景下,扩大进口具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既能缓解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贸易关系,又能促进中国自身经济做大做强、提高国内消费者福利水平。

从国际发展来看,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具有持续性,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由以前的单向开放转变为双向循环开放,即从以"出口"为主转变为"进口十出口"为主,只有这样,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才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今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有可能以扩大进口统筹国内外发展的模式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

从国内发展来看,2001年,大概 1/3 的国外进口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到 2016年,大概只有 20%的国外进口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可见,中国市场越开放,进口规模越多,中国国内市场竞争越激烈。对于消费者来说,进口增加会使得国内相关产品价格下降、产品种类增加,进而导致国内消费者受益。我们的测算结果发现,通过进口新产品,产品种类的增加导致每年国内消费者整体的福利水平大概增加 500 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进口对中国国内企业的影响很复杂,因为进口产品既包括中间品、消费品,也包括资本品。我们的研究初步发现,进口竞争对中国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对中国高生产率企业的冲击比较大,因为这些企业想去创新和研发,缩小与进口产品的差距。但是,由于差距大、投资多、周期长,所以高生产率企业最终可能会选择放弃积极应对、走低质低价的发展道路。而进口竞争对低生产率企业的发展可能有正面影响,面对进口竞争,低生产率企业如果不进行创新,可能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为了生存,这些企业会积极应对,加大创新和技术升级,从而低生产率企业会自动转型升级。也就是说,进口竞争的倒逼效应将发挥作用。在积极扩大进口背景下,需要进一步精准测算和模拟进口对国内不同企业发展的影响。

扩大进口只是我国对外开放或者改革开放的一种手段或形式,其根本目的是为国内经济发展、国内消费者服务的。增加高技术产品或高质量产品的进口规模是我国扩大进口的一项重要内容。一般认为,加强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会让外国企业愿意出口更多高技术产品、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会导致模仿的成本增加,对国内模仿产生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从国外进口更高技术的产品,获得的利润也会更高,会导致模仿的动机增加,即对国内模仿产生引诱作用。如果抑制作用没有超过引诱作用,那么即使知识产权保护加强,

外国企业也不会对中国出口更高技术的产品。再加上部分发达国家对出口中国高技术产品管制十分严格,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否促进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还不确定。

此外,习总书记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积极扩大进口、主动扩大进口。我们认为进口有狭义和广义的概念,在理解"扩大进口"时,要从广义的概念去理解进口,"扩大进口"不仅仅指进口货物,也包括进口服务,还包括进口资本、吸引国际人才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扩大进口,不仅仅是外贸政策,更是今后中国对外开放整体战略的重要抓手和引领性政策。

符大海(中央财经大学):自 2018 年 3 月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双边关税不断加征。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本质及其长期影响,选择好应对策略。

(一)中美贸易冲突的原因

第一,贸易利益之争。自由贸易有许多好处,但是贸易本身不能解决分配问题。在一国之内,贸易分配效应可以通过国内的政策手段来解决,如补贴政策、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等,但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问题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看成是贸易利益分配问题,把美国国内失业和产业空心化都归咎于中美贸易不平衡。他单方面认为美国在美中贸易中赤字越来越大,美国的利益受损了。中国在加入WTO以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获益者。所以,他要通过关税手段去重新调整不平衡的贸易利益分配。中美贸易利益问题已经从原来绝对量的比较变成了相对量的比较。特朗普一开始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作为他发起中美贸易冲突的直接原因。

第二,技术赶超之争。从近期的华为事件看出,贸易摩擦问题只是浅层次的问题,再往下就是中美之间的技术赶超之争。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的技术进步没有任何问题,大家都会获利。以前中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在玩具、鞋子、衣服生产中的技术进步对美国有利,而美国在汽车、飞机制造或者高技术的电子产品上的技术进步对中国同样有利。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以后,美国发现中国在进口竞争部门取得了飞速的技术进步,对美国的出口带来了挑战。所以,现在中国的技术进步对美国原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形成了挑战,这必然是动了美国的奶酪。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签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对华为提供核心技术,这很明显存在技术赶超之争。

第三,全球领导之争。中国 2017 年的 GDP 占美国的 63.2%,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历史上,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一直不太平,以前是美日之争,现在是中美之争。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吸引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欧盟国家的加入。但是美国现在也还没有加入"一带一路",所以存在全球领导之争。还有诸如对 WTO 改革的建议,今年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瘫痪的风险,这都是由于美国在阻碍。其实都是在争取国际规则的引导问题,对国际政治经济治理的领导问题。

第四,发展道路之争。这是决定中美贸易冲突的一个更长期的根本原因。中美之间发展道路的差异不同:一是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独特性,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紧密结合,政府作用的发挥往往比西方市场经济要更大一些。二是政治制度体制不同。三是对国际格局认识的不同。四是文化宗教的根基不同。这些差异决定了中美冲突问题将是长期的,很难调和的,更需双方领导人极大的政治智慧才能有效管控的。

(二)中美贸易冲突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第一,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将对两国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带来一定程度的打击,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可能难以恢复。政策不确定性对消费者、企业创新都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二,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先例可能会对以后的美国总统形成一个不良示范。以后,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总统,在危急时刻是否也会学这一招,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国家安全为由,把政府的政策通过行政干预去执行。

第三,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会打乱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国际规则秩序面临着重塑。现在国际规则面临很大挑战,在规则的波动期,旧的规则不适应新的现象,但是新规则没有建立起来。即使新规则建立以后,还要有很长的适应期,这必然会增加国际贸易和政策的协调成本。

第四,中美贸易冲突会打乱或强行切割全球生产链,尤其是影响跨国公司重新选址问题和技术 配置问题,有可能导致他们重新布局,从而产生较大影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的贸易冲突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中美贸易冲突不是短期问题,涉及中美很多经济体制问题,也涉及产业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所以中美贸易冲突也必将是一个长期问题。

王方方(广东财经大学):对于改革开放以及全球经济的关系,我们认为通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力度深度,进一步促进了发展。我们构建了一个网络资本模型,其中网络资本可以视为国内和国际关系型的制度变量。基于这种网络的构建,我们认为通过 40 年的改革,其实就是在国内各区域之间和国际社会之间,通过加强从交通、政府关系、企业母子关系连接上的网络深度和广度,倒逼加强网络资本连接,促进区域发展。所以,网络资本作为一个制度变量,是以开放促改革和全球经济进一步深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改革、开放、发展三者关系上,我国 40 多年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从以往经验来看,凡在一个国家国内各地区之间,即使初始自然条件、劳动力条件等要素条件不具备比较优势,但通过开放,通过企业间的联系,通过政府对外的衔接,仍能够加深拓展网络关系,最终促进要素和资本的积累,以及网络资本的积累,从而加快区域经济增长的力度和潜力。总体上看,开放不仅可以倒逼国内改革,还可以通过加强投入一产出关系和产业分工定位促进产业发展,从而使我国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巴里·诺顿(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符大海的分析跟我们的分析非常接近:第一,国际贸易对美国国内的影响非常不平衡,最受影响的地区是美国老工业区,但是 2016 年他们大都投票给特朗普。第二,美国有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服务成本很高。但是美国政府后来的产业政策是不要吸收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第三,中国的发展道路跟美国有什么差别。1979—2009年间中国的发展模式真的是企业跟政府的合作吗?这不一定站得住脚,我认为最主要还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后来越来越放松,中国经济也越来越成功。而且还有另外一点,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有一个承诺,包括将来的国有企业完全是市场化竞争,不受政府的影响。

盖保德(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我想谈一下特朗普是怎么成功的,虽然这个问题很复杂。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九年了,很多经济体的恢复比较慢。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奥巴马总统的恢复政策没有成功,所以对整个美国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工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力的收入比较低,但是因为没有恢复,他们一直不满意,特朗普很善于利用这一点。

(编辑整理:刘洪愧) (校对:李仁贵)